

# 幸福智力解读：内涵、结构及可行性研究

## ——幸福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严标宾 郑 雪 张兴贵

**摘 要：**以往对“幸福”的研究经历了哲学思辨到实证探究两个重要阶段，但是目前的幸福研究仍然期待一种创新和突破。以幸福智力为新视角的幸福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在阐述幸福智力概念提出的缘由基础上，文章分析了幸福智力的内涵、结构，并对该概念提出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论证。幸福智力这一概念的提出及确认对幸福感理论和应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新视角，有利于激发更多创新性的相关研究，有抛砖引玉之效用。

**关键词：**幸福智力；内涵；结构；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B849：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65(2011)06-0089-08

### 一、前言

“幸福智力”是一个新近提出的概念，它的提出始于对“幸福”研究传统和研究现状的梳理和质疑。传统意义上的幸福研究以哲学探讨为主，包括东、西方的许多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思考过这一问题，提出了诸如“快乐主义幸福论”、“自我实现幸福论”、“仁者之乐”等著名观点和论断，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些理念和论断往往和人生价值观密不可分，具有明显的认识论、价值观和人性观的倾向<sup>[1]</sup>。随之而来的结果则是，各种理论和观点身上聚集着浓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变迁的痕迹，甚至有着明显的统治阶级的意识气氛，而对于幸福本质的探讨却略显重复和呆板，缺乏生气，招致了诸多学者的不满和批评。

这种不满在 20 世纪中后期以众多具体学科领域都探讨幸福的形式大量涌现，表现为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变表现为，在哲理思辨中加入了多种定量研究；研究内容的变化则吸纳了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大量相关知识，得出了许多重要结论<sup>[2]</sup>。但是，这些研究仍然没有交上关于“幸福本质”的满意答卷。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按照幸福研究者们的设想，随着幸福主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它会使人们从中受益，变得越来越幸福。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人们的幸福水平并没有因为了解了越来越多的幸福研究成果而得到相应提升。

幸福研究遭遇的这种困难和尴尬使我们认真地思考新的方向，慎重地选择新的研究视角和突破口。幸福智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收稿日期：2011-04-23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广东大学生幸福智力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10tjkl67）；广东省软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1B070400014）。

作者简介：严标宾，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广外粤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510006）

郑 雪，女，华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510631）

张兴贵，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510006）

## 二、幸福智力的内涵

简而言之,幸福智力是一种获取幸福的能力。具体来说,是指个体面对某一对象(包括人、事和物)或经历某一情境时感知和体验幸福的能力,以及依据其内在的某一标准表达、评价幸福的能力,还包括有意识地寻求各种策略调控幸福的能力。其中,幸福的产生有一定的生理基础,而判断是否幸福的内在标准则是个体在其先天遗传素质的基础上,通过与后天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

对于这一定义,我们作一些解释:

第一,幸福智力是一种能力。与幸福概念相比,幸福智力强调的是获取幸福的原因和过程,包括感知、体验、评价、调控等各种方式,而幸福只是其可能的一种结果。同时,因为它是一种能力,所以它不只是表现为感知、体验、表达、评价或调控等单一方式,而是由这多种因素相互联系而形成的有着一定组织和层次结构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既包括认知,也包括情感(如激动体验)和行为(如调控,包括思维领域的认知操作调控)。

第二,幸福智力的产生有一定的生理基础。神经生理学家们已经发现,人的大脑中有不同的系统控制着愉快和不愉快的情绪<sup>[3]</sup>。在大脑中,有专门控制幸福感产生的区域。

第三,幸福智力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一方面体现为个体在认知、体验、评价、调控以及它们组成的统一体上存在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每个主体在具体的认知、体验、表达、评价和调控方式上表现出独特性。

第四,个体的内在评价标准之所以说是相对稳定的,是因为这种标准不但受到个体的认知结构的影响,而且会受其人生观、价值观等取向的影响。它们相对稳定,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形成,但又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环境的影响作出一些调整 and 改变,所以幸福智力也是相对稳定的,但又具有可塑性和可变化性。

第五,幸福智力应该是一种状态存在,但又可以看成是个体获取幸福的方式方法,因为它除了包括对幸福的获取外,还包含了维持幸福和提高幸福的能力。在这些能力的具体操作中,个体或许还有一种运用幸福信息引导思维和行为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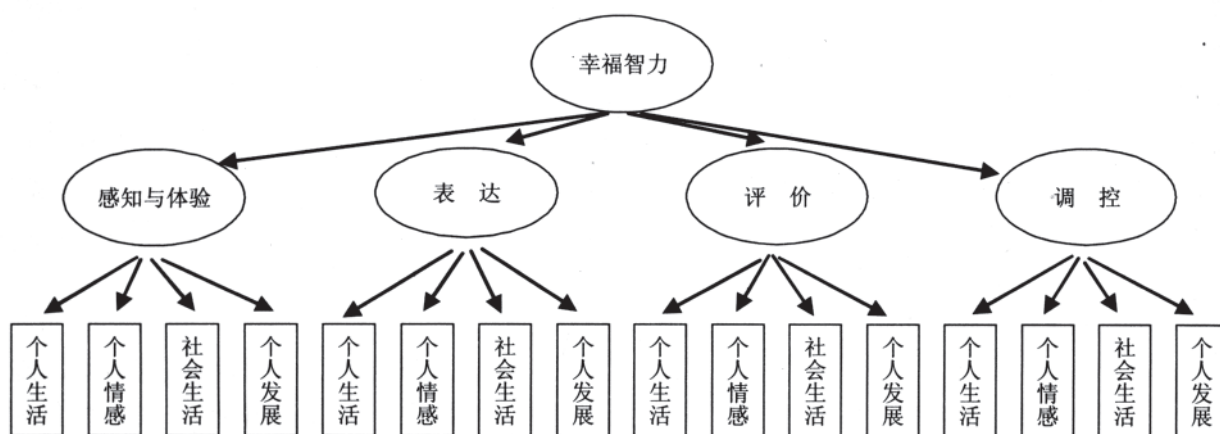


图1: 幸福智力的结构设想

## 三、幸福智力的结构

### (一) 幸福智力的结构组合

元素分析是结构分析的前提,正确划分元素才能正确认识结构。因此,要解析幸福智力的结构,首先要找到构成幸福智力的元素。根据幸福智力

的定义,我们设想,幸福智力结构由“操作维度”和“内容维度”两个独立的维度组成,每个维度包含不同的成分。

“操作”是指幸福智力的心理活动过程和心理活动方式。由感知和体验、表达、评价、调控等四种成分组成。这是根据幸福智力对幸福信息

的加工过程从低级到高级的相对独立的过程进行划分的。

“内容”是事物内部所含的实质性事物或意义,这里指幸福智力操作的对象和信息。这些对象和信息必定与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从而达到生存发展的某种完满的快乐有关,具体包括个人生活、个人情感、社会生活和个人发展等成分。

在此基础上,幸福智力可以分解成 $4\times 4$ 种获取幸福的能力。这16种幸福智力组合能力既可视作为一个整体,也可分为16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见图1)。不过,这16种组合能力在不同个体身上的体现可能并不均衡,即不同个体可能主要体现某一种或几种能力,毕竟,幸福智力也是由一个人的遗传基础和一定时空的后天生活环境共同决定的。因此它可以对个体幸福智力的专项测评和针对性干预提供依据和指导。

## (二) 幸福智力组合结构存在的一些日常证据

### 1. 体育、娱乐、艺术活动中的证据

自古以来,人们都将体育、娱乐和艺术活动作为获取幸福的重要源泉。它们既被当作幸福智力的内容,又被当作幸福智力的操作。当作内容时,可以是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日常体育娱乐),也可以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如各种比赛),可以是情感的重要寄托和展现(如艺术表演),又可以是个人的重要平台(如把体育或艺术当作个人的事业);当作操作时,个体从中能感知和体验幸福,又有对幸福的表达和评价,还有对幸福的调控。

对于体育活动,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人们力比多的投放过程,幸福智力理论则认为这是人们追求幸福的有效途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思想就蕴含着幸福的感知和体验;“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也正是调动和挖掘个人潜能,并在这种过程中极大地提升幸福体验。不过,当这种体育活动演变成体育比赛时,则加入了更多的幸福表达和评价的成分了。对于观看比赛的人来说,除了体验着比赛的乐趣外,对比赛可观赏

性和比赛结果的态度都体现了幸福智力的操作。而诸如巴西人偏爱足球、美国人偏爱篮球、中国人偏爱乒乓球和羽毛球等不同群体对不同活动的偏好又体现了幸福智力在群体上的不同特征。

文学、艺术活动如歌舞、影视等也如体育活动一样可以很好地体现幸福智力的操作特征。无论是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还是其欣赏者都比较全面地将感知与体验、表达、评价,以及调控等幸福智力的各种操作集于一体。幸福智力在艺术领域的体现还有另外的证据——人们发现,越是原始的部落,越是落后的民族,音乐和舞蹈越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经常和宗教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有一定的仪式。无疑,这是他们提升幸福的重要途径。

### 2. 学习和工作中的证据

学习和工作同样既可以是幸福智力的内容,又可以看成是幸福智力的操作。当作内容时,可以是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日常学习或工作),也可以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如为国家和社会工作),可以是情感的重要寄托和展现(如陶醉于工作),又可以是个人的重要平台(如将工作当作个人的事业);当作操作时,个体也能从中感知和体验幸福,又有对幸福的表达和评价,还有对幸福的调控。

## 四、幸福智力提出的适宜性

### (一) 幸福智力提出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首先,从理论上讲,这种必要性首先体现为幸福研究发展的内在需要。我们知道,幸福主题的研究从哲学领域过渡到具体学科领域,都没能有效克服其理论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各种理论的自身发展不完善,对幸福的解释力有限。例如在解释“金钱影响幸福”这一现象时,幸福的比较理论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这一理论在面对“为什么一些生活在富人圈子的人虽然贫穷却很快乐”之类的问题时却显得有些吃力,无法自圆其说。另一方面,不同理论之间的争论始终存在。例如,人格理论对“金钱影响幸福”现

象有不同于比较理论的解释——人们具有一种幸福或者不幸福的遗传素质<sup>[4]</sup>。不仅如此,理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异常复杂的。例如,虽然比较理论和人格理论都对“金钱影响幸福”现象作出过解释,但两种理论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个体的人格影响其使用社会比较信息的方式<sup>[5]</sup>。

类似的情形比较普遍,这对于幸福主题的进一步研究有害无益。因此,寻求一种新的研究理念,突破这种研究瓶颈,整合或理顺这些不同研究是幸福研究理论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也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其次,幸福智力概念的提出也是基于现实的客观需要,源于人们提高自我幸福水平的整体需求——尽管今天的人们比过去拥有更充分的自由和物质享受、更优良的教育和娱乐,但人们的幸福水平并没有预想中的那样得到相应提高。

## (二) 幸福智力提出的可行性

第一,理论可行性分析。任何一个理论的提出都必须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3个方面能够对问题进行有效的探讨。本体论问题涉及“幸福智力的形式和本质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是如何运作的”等系列问题。对此我们在幸福智力的定义中有了肯定和明确的回答。认识论问题探究的是“我们是如何认识幸福智力的”。因为我们相信“幸福智力问题”真的存在,所以我们必定采取主客二分的关系或价值的相对中立的态度。方法论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是通过什么方法发现幸福智力的”。这一问题的回答受到前面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制约,决定了我们主要采用定量的利于操纵的方法,从而保证研究的可靠性。总之,虽然是一个新提出的概念,但幸福智力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现实情境的可行性分析。幸福智力的提出还得益于现实情境的启发。幸福研究经历了几千年却还是未能解决其基本的外延甚至是内涵的争议问题,不能不令人觉得遗憾。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仍清醒地看到不同研究的相似之处,即都承认人们追求幸福的天性<sup>[6]</sup>。这样就不难理

解,为什么既使在物质生活极度贫乏、战乱横行的年代,许多人还是经常体验到幸福。这些事实也呼唤着我们重新思考幸福主题的研究方向。如果我们抛开和搁置原有的难题,不争论“幸福是什么”或“怎样才能得到幸福”等没有定论的问题,而是另辟蹊径,转而探讨如何才能获得幸福的问题,那么我们是否会有更多的发现和收获呢?人们的这些幸福体验提示我们,是否人类存在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帮助个体在生活中获取幸福,或创造幸福?既然这种能力与获取幸福有关,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获取幸福是一种能力,进而将之称为幸福智力呢?

当然,我们无法回避“既然连幸福是什么都没有清楚,又如何知道怎样去追求和获得幸福”的质疑,对此,幸福感的主观性特点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幸福具有独特性和主观性,因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情境和事情的幸福评价或体验,或者相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事件或情境的幸福评价和体验都可能不同。这样,既使他们都感觉到很幸福,但如果你问他幸福是什么,他可能无法给你满意的回答,可是如果你问他为何会感到幸福,他一定会给你充足的理由。因此,对他来说,什么是幸福并无紧要,也无须太多解释,重要的是他知道怎样去得到这种幸福。

## (三) 幸福智力提出的实证基础

智力概念的提出还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1. 幸福智力符合智力的诸多特征,如幸福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而智力是一种处理抽象东西的能力<sup>[7]</sup>;智力水平的高低可以表现为个体处理与情境关系的能力,幸福智力也考虑了个体在不同情境中幸福感水平的差异体现;智力是一种学习能力<sup>[8]</sup>,幸福智力也强调其可变动性,强调个体的努力对提升其幸福感的作用。
2. 幸福智力满足智力生物科学性的标准。幸福智力独立于其他智力的存在,既使负责产生幸福的器官受到损伤,病人的其他智力仍然会完好无损<sup>[9]</sup>。
3. 从逻辑分析上来看,幸福智力的核心能力可以分解为我们定义中提到的知觉、体验、表达、评价、调控等。
4. 与其他



智力一样,幸福智力也有自己的发展历程,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跨文化研究已经证实了不同群体获取幸福的差异性<sup>[10]</sup>。5.幸福智力得到了实验心理学和心理测量学研究的支持。前者发现了人体幸福时脑的活动区域与其他智力活动时不同<sup>[11]</sup>,后者则发现被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具有相似的幸福水平<sup>[12]</sup>。6.受“幸福是一种能力”观点的启示<sup>[13]</sup>。

## 五、“幸福智力”隶属智力范畴的更多证据

(一)“幸福智力”与智力在重要特征上的相似性

### 1. 两者发展的影响因素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智力是如何产生的?”、“影响智力发展的因素有哪些?”这是智力概念分析中必须要解答的核心问题<sup>[14]</sup>。关于这一问题,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它是在人的遗传素质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实践活动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幸福智力”同样没有回避其“影响因素”的问题。因为幸福智力是个体获取幸福的一种能力,所以可以说,如果个体的幸福(感)水平较高,那么就代表其幸福智力的水平较高。基于这种逻辑,我们在论述幸福智力的影响因素时并没有将幸福感和幸福智力进行严格地区别,即如果提到幸福感水平较高时意味着有较高的幸福智力,而提到较高的幸福智力时则自然表示会获得较高的幸福感。过去的研究已经确定的影响幸福智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1) 遗传的作用及生物学基础

遗传究竟在幸福的获得能力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心理学家从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第一,血缘关系的研究。Tellegen 等的著名双生子研究发现<sup>[15]</sup>:在不同的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生子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接近程度,比在同一个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异卵双生子要高得多。

第二,人格与幸福的关系研究。许多研究都表明,主观幸福感(SWB)主要依赖于人格特质,

人格同心理幸福感(PWB)也有着很强的联系。Schmutte 和 Ryff 发现神经症、外倾和责任心都是 PWB 诸多方面强有力的因子<sup>[16]</sup>。我们认为,人格与幸福之间应该存在一种“能力媒介”,即人格影响幸福智力,幸福智力导致不同的幸福水平。这样可以更好地解释过去关于两者关系的许多研究。换句话说,幸福智力具有比较稳定的人格基础。

第三,幸福感的生物学基础。Gray 的人格理论认为<sup>[17]</sup>,人格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人体内存在的两个基本脑动力系统:行为激活系统通过奖励调节行为、控制行为趋向;而行为抑制系统通过惩罚调节行为,出现惩罚威胁时抑制行为。不同人对奖惩感受性不同,因而形成了个体差异,从而导致幸福智力的差异。

幸福智力的生物学基础的另外的证据来自于 Davidson 等的研究。他们发现,在实验室情景中婴儿表现出来的恐惧行为与婴儿在活动前的左额叶和右额叶的相对活动量相关。这表明基因可能会导致大脑情绪中心反应性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代表了体验更高或更低水平幸福感的基本生理倾向。20 世纪 50 年代,奥尔兹发现动物的丘脑下部和某些中脑核区是“快乐中枢”<sup>[18]</sup>。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支持。

#### (2) 环境和教育的影响

遗传因素只为幸福智力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自然条件,在后天的成长环境中,人们幸福智力水平的高低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第一,社会关系。包括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等,都可能对主观幸福智力产生影响。良好的社会关系会促进幸福智力的发展,进而增加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而劣性的社会关系则会阻碍幸福智力的发展,进而降低主观幸福感。

第二,经济状况。经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积极的相关,Bradburn 研究表明,高收入者有较多的积极情感,而低收入者则产生较多的消极情感<sup>[19]</sup>。Inglehart 则发现,当收入改变时,人们的幸福感或满意感也会发生变化<sup>[20]</sup>。

第三,教育。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享受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通过后天的培养。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观点。Compbell 研究表明<sup>[21]</sup>,教育对 SWB 会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女性身上可能表现更为明显。南京市游府西街幼儿园实施了幸福课程研究,提升学生获取幸福的能力,取得重要成效<sup>[22]</sup>。

第四,社会阶层。英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应用不同的测量方式发现社会阶层对幸福感有着某种曲线似的影响。同时,这种曲线影响存在一种模式,即社会阶层越低,它对幸福感的影响就越大。

第五,社区关系。研究发现人们一般对其居住环境感到满意,即使是居住较差环境的个体也这样认为;而且乡村的居住者对其环境感到幸福或满意的人数比例高于城市的居住者。

第六,文化。文化往往通过价值观、目标倾向、评价准则、态度类型、行为模式等对人们获取幸福的过程产生影响<sup>[23]</sup>。

### (3) 实践活动的影响

除了较被动地受到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外,人们还可以主动地进行各种活动,发展其幸福智力,从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

第一,工作。工作与幸福感的关系突出表现为工作满意度。工作满意度涉及员工对工作或工作环境的各个方面的感受。另外,对于总的工作,员工也会产生一个总体的情感反应,这是建立在对工作各个侧面的满意度整合基础上的一般满意度。

第二,体育锻炼。研究者对体育锻炼与幸福感的关系比较感兴趣,也比较一致地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积极的相关。例如,Carter 发现身体锻炼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是 0.27<sup>[24]</sup>;张巧兰则发现进行中等运动量体育锻炼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最强<sup>[25]</sup>。

第三,有价值的活动。Cantor 和 Sanderson 认为,参加有价值的活动会对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sup>[26]</sup>。特别是如果将其纳入生活目标的范围时,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将会更大。

第四,各种策略。为了获得主观幸福感,可以采取的策略包括:(1)避免适应,增加日常生活

中对积极情感的频繁体验;(2)主动约定;(3)提高日常生活中的积极事情的数量;(4)关注体验的愉快方面;(5)其他有关的策略。包括日常生活中追求有意义的个人目标;保持忙碌,花更多时间交际等<sup>[27]</sup>。提高心理幸福感的有效策略包括:(1)注重个人表达;(2)设计心理幸福感的干预策略;(3)注重自我决定。要有效提高社会幸福感,也有一些可以采纳的途径,例如(1)与社会进行整合;(2)进行社会服务和娱乐参与。

当然,不难发现,实践活动事实上也可以归纳到后天环境的范畴。我们之所以将其分开进行阐述,主要是因为个体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更多地是被动的成分,而实践活动则有更多的主动参与。

不难看出,幸福智力也是以遗传素质为基础,通过后天实践活动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这与智力的发展情形惊人的相似。显然,比较这种相似性能更有力地将“幸福智力”纳入智力概念的范畴,进一步消除人们对“幸福智力”是否真是作为一种智力存在的质疑。

### (二) 两者在认知操作特征上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与智力相比,“幸福智力”的认知操作也存在比较、归因等一系列认知操作过程,具有明显的智力加工痕迹。比较有影响的是以下几方面:

#### 1. 加工方式

人们在面对各种刺激物时,其加工奖赏和惩罚信息的方式决定了幸福感。这种认知操作认为,人们加工愉快信息比不愉快的信息更准确和有效。这样,认知影响行为,行为则影响外在的情景和主观幸福感。

#### 2. 社会比较。

Wood 认为<sup>[28]</sup>,社会比较是一个思考与自我相关的他人信息的过程。社会比较的动机有自我评价、自我提升和自我进步,这都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

#### 3. 归因

Abramson 对一些抑郁的个体和快乐的个体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个体报告的 SWB 存在差

异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之间归因风格的不同<sup>[29]</sup>。Argyle 等也认为,个体积极地评价自己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体验进行了能够提升 SWB 的合理解释<sup>[30]</sup>。

无疑,认知操作方式上的相似性再一次为“幸福智力”纳入智力家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再一次确保了“幸福智力”概念的正确性。

## 六、幸福智力的评价

总的看来,幸福研究理论的兴趣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用已有的理论解释幸福,二是如何在幸福的研究中生成不同的理论发现。前者重在印证,后者力求创新,都是寻求对幸福问题作更全更新的解释。由于幸福主题的探讨有过漫长的历史,但关于幸福实质的分析却仍没有定论,原有的诸多理论似乎并不能给人们提供满意的答案,因此新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幸福智力的提出是一种创新,力求为幸福研究寻求新的理论解释。尽管借鉴了许多过去的研究成果,但那只是研究的手段,而非目的。

与此同时,它的提出有利于对已有的幸福研究进行新的思考,有利于解决过去幸福研究领域长期争执的局面。很显然,研究主题的导向远比研究方法的提升更加重要。方法只是达成目标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方法的滞后可能会影响研究的进程,但仍然能揭示幸福的真实面貌。相反,如果研究方向不妥当,那么越先进的方法获得的结果越是不可信。这些结果要么不能真实地反映幸福问题的内在实质,要么与实质根本就是南辕北辙。因此,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利于进一步诠释和突破幸福研究的瓶颈,理顺过去哲学和具体学科领域幸福研究存在的矛盾和不一致,化解幸福研究存在的各种冲突和争议,在一定程度上扼制幸福研究混乱和无序的局面。但是我们也深深地明白,这一概念的提出必然会面对类似于对智力领域不统一的那些质疑。既然智力领域也长期存在争议,为什么说幸福智力的提出能有效解决幸福研究中的争议呢?对此,我们认为,尽管学者们

对智力的探讨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但这种不一致更多体现在智力的结构方面,而智力这一概念的存在却是公认的。因此,幸福智力只是拓展了智力研究的范畴,我们关注的也只是在智力这一大范畴中的幸福智力究竟是怎样的,并不试图卷入有关智力的争议中。

另外,幸福智力概念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一个新生的概念而言,概貌性的系统研究比局部的深入研究更为重要。但是全面往往与粗略为伴,因此幸福智力概念的理论建构还比较粗糙,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这样,有关它的概念界定包括其内涵和外延等尚需进一步深化,同时在其理论论证和结构探讨等方面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 参考文献:

- [1] 陈根法.幸福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2] 卢娟.几种幸福观的科学理解[J].科学之友,2005,(11): 83-86.
- [3] 顾媛媛,罗跃嘉.主观幸福感的脑机制[J].心理学科学进展,2009,17(5): 957-963.
- [4] Diener, E., Suh, E., Lucas, R., et al. (1999).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2):276-302.
- [5] 张兴贵.幸福与人格[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
- [6] 林剑.幸福论七题——兼与罗敏同志商榷[J].哲学研究,2002,(4): 48-54.
- [7] 皮连生.智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 [8] 莫雷.教育心理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9] 吴大兴,姚树桥.正负性情绪平行神经模型的理论建构[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15(5):493-497.
- [10] 严标宾,郑雪.幸福感研究对娱乐治疗法的启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123-128.
- [11] Gainotti, G. (2000). Neuropsychological theories of emotion. In J.C. Borod (Eds.), *The neuropsychology of emo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15-235.
- [12] Braungart, H. M., Plomin, R., Defries, J. C., et al. (1992). Genetic influence on tester-rated infant

- temperament as assessed by Bayley's infant behavior record: Nonadoptive and adoptive siblings and twi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8(1): 40-47.
- [13] 张忠仁. 积极心理学的幸福能力观 [J]. 理论界, 2006, (5):140-141.
- [14] 张积家. 普通心理学 [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15] Tellegen, A., Lykken, D.T., Bouchand, T. J. (1988). Personality similarity in twin reared apart and togeth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6):1013-1039.
- [16] Schmutte, P. S., Ryff, C. D. (1997). Personality and well-being: Reexamining methods and mean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3): 549-559.
- [17] Gray, J. A. (1980). A critique of Eysenck's theory of personality. In Eysenck, H. J. (Ed.), *A model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Springer, 246-276.
- [18] 汤普森. 生理心理学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1.
- [19] Bradburn, N.M. (1969).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hicago: Aldine.
- [20] Inglehart, R.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1] Campbell, A. (1981). *The sense of well-being in America* [M]. New York, McGraw-Hill.
- [22] 南京市游府西街幼儿园. 提升获取幸福的能力——“幸福课程”第二阶段研究简介 [J]. 早期教育, 2003, (8): 19-20.
- [23] 邹琼. 主观幸福感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综述 [J]. 心理科学, 2005, 28(3): 632-633.
- [24] 陈作松. 身体锻炼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综述 [J]. 体育科学, 2005, 25(5): 65-68.
- [25] 张巧兰.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体育锻炼的关系研究 [J]. 浙江体育科学, 2004, 26(1): 93-96.
- [26] Cantor, N., Kihlstrom, J. F. (1985). *Social intelligence: The cognitive basis of personality*. In Shaver (Eds). *Self, situations and social behavior.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everly Hills, CA: Sage, 15-34.
- [27] Fredrickson, B. & Joiner, T. (2002). Positive emotions trigger upward spiral toward emotional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2): 172-175.
- [28] Wood, J. V. What is social comparison and how should we study i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2(5): 520-537.
- [29] Abramson, L. Y., Seligman, M. E. & Teasdale, J. D. (1978). Learned helplessness in humans: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7(1): 49-74.
- [30] Argyle, M. & Cross, L. J. (1987). The dimensions of positive emo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6(2): 127-137.

(责任编辑: 孙湘瑞)

## A Study of Well-being Intelligence with Its Connotation, Structure and Workability—a New Perspective

1 Yan Biaobin 2 Zheng Xue 3 Zhang Xingui

(1, 3 School of Management, GDUF, Guangzhou 510006;

2 Center for Studies of Psychological Appli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well-being has passed through two important stages, namely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and empirical exploration. However, an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 are expected for the research of well-being at present, which is the base of well-being intelligence research. With the causality of bringing forward well-being intelligence, this article analyses its connotation and structure.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workability of the concept of well-being intelligence. The new concept provides a valuable new perspective for well-being research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which will be beneficial to stimulate more inventive studies of the kind.

**Key words:** well-being intelligence; connotation; structure; workability